

北京图书馆藏

42915 2

文学研究丛书

中文资料

当代三十部文学名著是怎样写成的



5.6

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

以裨益于我们今后的工作，更好地促进文学学术研究和资料交流。

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室

一九八〇年三月于太原

前 言

在伟大的新长征中，各条战线都在努力为“四化”多做贡献。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瓣心香和殷切冀望，我们拟发掘、组写、蒐集、编印这套“文学研究丛书”，以促进文学学术研究和交流。

“文学研究丛书”，将据其不同内容而分册辑集。其主旨是要为文学研究工作、文学教学工作和文学创作，提供一些重要的、极需的，并且具有文学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学习、研究参考资料。力求做到新鲜、蕴深、准确、系统，思想性与艺术性兼蓄，资料性与丰富性并备；融生动、严谨为一体，揉阔博、深邃成合璧。

“文学研究丛书”第一辑，题为《当代三十部文学名著是怎样写成的》，共组写、辑录了三十篇谈当代（现代）著名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和经过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作家本人写的。从整体上看来，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：一、我们这次新组写的；二、作家本人过去写的，这次原文照录；三、虽然是过去写的，但在这次收辑之前又经作者重新作了修改和补充。在属于上述第二、第三种情况的些许篇什中，这次收辑时我们倘作了必要的易名和删节，这是为了使之删繁就精，立意突出，更适合本书的主旨要求。

希望看到这本书的同志，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

目 录

《阿Q正传》的成因·····	鲁 迅 (1)
《子夜》是怎样写成的·····	茅 盾 (7)
和读者谈谈《家》·····	巴 金 (15)
我怎样写五幕历史剧《屈原》·····	郭沫若 (23)
我怎样写《骆驼祥子》·····	老 舍 (31)
我怎样写《春蚕》·····	茅 盾 (36)
《雷雨》的写作情况和经过·····	曹 禺 (41)
由《包身工》所引起的回忆·····	夏 衍 (55)
歌剧《白毛女》的创作经过·····	丁 毅 (60)
《龙须沟》写作经过·····	老 舍 (64)
《吕梁英雄传》的写作经过·····	马烽 西戎 (67)
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写作简述·····	丁 玲 (71)
《暴风骤雨》是怎样写的·····	周立波 (75)
《三千里江山》写作漫谈·····	杨 朔 (80)
我是怎样写《铁道游击队》的·····	刘知侠 (91)
《保卫延安》的写作经过·····	杜鹏程 (95)
我怎样写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·····	魏 巍 (109)
《三里湾》写作前后·····	赵树理 (113)
漫谈《红旗谱》的创作·····	梁 斌 (125)
关于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话·····	李英儒 (156)
二谈《红日》的写作经过·····	吴 强 (164)

略谈《红岩》的写作·····	罗广斌 杨益言	(181)
关于《林海雪原》·····	曲 波	(187)
关于《山乡巨变》写作情况的答问·····	周立波	(195)
我为什么能够写出《青春之歌》·····	杨 沫	(200)
吴琼花形象的塑造经过·····	梁 信	(210)
《李双双》写作经过·····	李 准	(225)
《水向东流》写作简述·····	李满天	(235)
柳青是怎样写作《创业史》的·····	徐民和	(241)
《李自成》创作摭谈·····	姚雪垠	(252)

《阿 Q 正传》的成因

鲁 迅

在《文学周报》二五一期里，西谛先生谈起《呐喊》，尤其是《阿 Q 正传》。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，也想借此来说一说，一则算是做文章，投了稿；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。

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——

“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，原不是无因的。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，如最后‘大团圆’的一幕，我在《晨报》上初读此作之时，即不以为然，至今也还不以为然，似乎作者对阿 Q 之收局太匆促了；他不欲再往下写了，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‘大团圆’。象阿 Q 那样的一个人，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，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，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。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。”

阿 Q 是否真要做革命党，即使真做了革命党，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，现在姑且勿论。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，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。我常常说，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。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，其实是真情。我没有什么文章要做，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，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，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。譬如一匹疲牛罢，明知不堪大用的了，但费物何妨利用呢？所以张家让我耕一弓地，可以的；李家要我挨一转磨，也可以的；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：敝店备有肥牛，出售上等消毒滋养

牛乳。我虽然深知自己是怎么瘦，又是公的，并没有乳，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，情有可原，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倘若用得我太苦，是不行的。我还要自己觅草吃，要喘气的功夫；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，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，也不行的，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。如果连肉都要出卖，那自然更不行，理由自明，无须细说。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，我就跑，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。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，从战士化为畜生，吓我以康有为，比我以梁启超，也都满不在乎，还是我跑我的，我躺我的，决不出来再上当，因为我于“世故”实在是太深了。

近几年《呐喊》有这许多人看，当初是万料不到的，而且连料也没有料。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，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。也不很忙，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。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：LS，神飞，唐侯，某生者，雪之，风声；更以前还有：自树，索士，令飞，迅行。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，因为那时的《新青年》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。

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，真可怜，侦察了百来回，竟还不明白。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问过一次人；“鲁迅即周树人”是别人查出来的。这些人有四类：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，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；一类单是好奇；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，所以特地揭出来，想我受点祸；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，想要钻进来。

那时我住在西城边，知道鲁迅就是我的，大概只有《新青年》，《新潮》社里的人们罢；孙伏园也是一个。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。不知是谁的主意，忽然要添一栏称为“开心话”的了，每周一次。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。

阿Q的影象，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，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。经这一提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晚上便写了一点，就是第一章：序。因为要切“开心话”这题目，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，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。署名是“巴人”取“下里巴人”，并不高雅的意思。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，但我却一向不知道，今年在《现代评论》上看见涵庐（即高一涵）的《闲话》才知道的。那大略是——

“……我记得当《阿Q正传》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，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，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。并且有一位朋友，当我面说，昨日《阿Q正传》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。因此便猜疑《阿Q正传》是某人作的，何以呢？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。……从此疑神疑鬼，凡是《阿Q正传》中所骂的，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；凡是与登载《阿Q正传》的报纸有关的投稿人，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《阿Q正传》的作者的嫌疑犯了！等到他打听出来《阿Q正传》的作者的名姓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，因此，才恍然大悟，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。”（第四卷第八十九期）

我对于这位“某人”先生很拖欠，竟因我而做了多天嫌疑犯。可惜不知是谁，“巴人”，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，或者是四川人罢。直到这一篇收在《呐喊》里，也还有人问我：你是在骂谁和谁呢？我只能悲愤，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。

第一章登出之后，便“苦”字临头了，每七天必须做一篇。我那时虽然并不忙，然而正在做流民，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，连好好写字的地方也没有，那里能够静坐一会，想一下。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，但已经笑嘻嘻，善于催稿了。每星期来一回，一有机

，会就是：“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。明天要付排了。”于是只得做，心里想着，“俗话说：‘讨饭怕狗咬，秀才怕岁考。’我既非秀才，又要周考，真是为难……。”然而终于又一章。但是，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；伏园也觉得不很“开心”，所以从第二章起，便移在“新文艺”栏里。

这样地一周一周地挨下去，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。据我的意思，中国倘不革命，阿Q便不做，既然革命，就会做的。我的阿Q的命运，也只能如此，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。民国元年已经过去，无可追踪了，但此后倘再有改革，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。我也很愿意为人们所说，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，但我还恐怕我所看到的并非现代的前身，而是其后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。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，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；此后十五年，长虹“走到出版界”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“绥惠略夫”了么？

《阿Q正传》大约做了两个月，我实在很想收束了，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，似乎伏园不赞成，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，他会抗议，所以将“大团圆”藏在心里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。到最末的一章，伏园倘在，也许会压下，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。但是“会逢其适”，他回去了，代庖的是何作霖君，于阿Q素无爱憎，我便将“大团圆”送去，他便登了出来。待到伏园回京，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。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，如何笑嘻嘻，也无法再说“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”。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，可以另干别的去。干了别的什么，现在也已经记不清，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。

其实“大团圆”倒不是“随意”给他的；至于初写时可

曾料到，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。我仿佛记得：没有料到。不过这也无法，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“大团圆”？不但对于阿Q，连我自己将来的“大团圆”，我就料不到究竟怎样。终于是“学者”，或“教授”乎？还是“学匪”或“学棍”呢？

“官僚”乎，还是“刀笔吏”呢？思想界之权威”乎，抑“思想界先驱者”乎，抑又“世故的老人”乎？“艺术家”？“战士”？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“亚拉籍夫”乎？乎？乎？乎？乎？

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，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。

先前，我觉得很有写得“太过”的地方，近来却不这样想了。中国现在的事，即使如实描写，在别国的人们，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，也都会觉得 grotesk。我常常假想一件事，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：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，却往往更奇怪。在这事实发生以前，以我的浅见寡识，是万万想不到的。

大约一个多月以前，这里枪毙一个强盗，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，一共打了七枪。不知道打了不死呢，还是死了仍然打，所以要打得这么多。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，说：这是民国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；现在隔了十多年，应该进步些，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。北京就不然，犯人未到刑场，刑吏就从后脑一枪，结果了性命，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。所以北京究竟是“首善之区”，便是死刑，也比外省的好得远。

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《世界日报》，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，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，题目是《杜小拴子刀铡而死》，共分五节，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——

▲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，先时，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

毅军各兵士的请求，决定于“梟首刑”，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，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。刀是长形的，下边是木底，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，刀下头有一孔，横嵌木上，可以上下活动，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，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。……杜并没有跪，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：要人把着不要？杜就笑不答，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，自己睡在刀上，仰面受刑，先时行刑兵将刀拉起，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，杜的身首，就不在一处了。当时流血极多。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，也各偷眼去看，中有赵振一名，身上还发起颤起。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，先毙宋振山，后毙李有三赵振，每人都是一枪毙命。……先时，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，都在场观看，放声大哭，到各人执刑之后，去大喊：爸！妈呀！你的仇已报了！我们怎么办哪？听的人们非常难过，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。

假如有一个天才，真感着时代的心搏，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，我想，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，在西历十一世纪，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。

这真是怎么好……。

至于《阿Q正传》的译本，我看见过两种。法文的登在八月份的《欧罗巴》上，还止三分之一，是有删节的。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，但我不懂英文，不能说什么。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：一是“三百大钱九二串”当译为“三百大钱，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”的意思；二是“柿油党”不如译音，因为原是“自由党”，乡下人不能懂，便讹成他们能懂的“柿油党”了。十二月三日，在厦门写。

《子夜》是怎样写成的

茅 盾

这一个题目在《子夜》的《后记》上我已经说过了，诸位看了那篇后记，已可知道一个大概。不过诸位既然出了这个题目，要我们谈谈，那就随便谈谈吧。

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说：第一是写作的动机，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，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，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，在日本约二年，一九三〇年春又回到上海。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，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，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。当时我眼病很厉害，医生嘱我，八个月甚至一年内，不要看书，不然，则暂时好了，将来也不免复发。我遵医嘱静心养病，并且眼疾而外，又病神经衰弱，我便一意休养。每天没事，东跑西走，倒也很容易过去。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，本来是很复杂的。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，也有自由主义者，同乡故旧中间，有企业家，有公务员，有商人，有银行家，那时我既有闲，便和他们常常来往。从他们那里，我听了很多。向来对社会现象，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，现在看得更清楚一点了。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。后来眼病好一点，也能看书了。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，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，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。

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，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。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，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，虽然一九三〇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，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，大部分我还能了解。

一九三〇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。中国民族资本家，在外资的压迫下，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，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，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，增加工作时间，减低工资，大批开除工人。引起了强烈的工人的反抗。经济斗争爆发了，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大转变为政治的斗争，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。

在我病好的时候，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行得激烈的时候，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方面：（一）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，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，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，为要自保，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；（二）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；（三）当时的南北大战，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。

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。我打算从这里下手，给以形象的表现。这样一部小说，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，但我所要回答的，只是一个问题：即是回答了托派，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，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，但是因为一九三〇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，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。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。当时，他们的“出路”是两条：（一）投降帝国主义，走向买办化；

（二）与封建势力妥协。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。

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。我向来的习惯：冬夏天不大写作；夏天太热，冬天屋子里生着火炉有点闷人。一九三〇年冬整理材料，写下详细大纲，列出人物表，男的女的，资本家工人，……他们各人的性格，教养以及发展等等，都拟定了。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，然后才开始写。当时我的野心很大，打算一方面写农村，另方面写都市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，因为农村的不安定，农村经济便向都市集中。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，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，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的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，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，同时流在都市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，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。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，而是投入投机市场。《子夜》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。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，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“交响曲”。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十四章以后，夏天便来了，天气特别热，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。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，尤其热不可耐，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。

直到“一、二八”以后，才把这本小说写完。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，兴趣减低了，勇气也就小了，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，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，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。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，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。把都市方面，（一）投机市场的情况；（二）民族资本家的情况；（三）工人阶级的情况，三方面交错起来写。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，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，就不能出版，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

版，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。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。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，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。

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？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，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悉，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。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二九年丝价大跌，因之影响到茧价。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。

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：先把人物想好，列一个人物表，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，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，把它分章分段，使它们联接呼应。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，而是抄袭旁人的。巴尔扎克，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，他打算作一个书坊老板，翻印名著袖珍本，他同一个朋友讲好，两人合办，后来赔了钱，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。但是他没有钱：只得写小说去还债。他和书店订下合同，限期交货。但是因为时间仓卒，经常来不及，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，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，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。这样便能按期交稿，收到稿费。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，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。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，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。

《子夜》开头第一章，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，患脑充血而死。吴老太爷好象是“古老的僵尸”，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。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：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，便知道这是指什么。第二章是热闹场面。借了吴太爷的丧事，把《子夜》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。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，同时提出然后交错地发展下去……在结构技巧上竭力避免平淡，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。

附：

《子夜》后记

茅盾

右《子夜》十九章，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，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脱稿；其间因病，因事，因上海战事，因天热，作而复辍者，综计亦有八个月之多，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，未遑细细推敲。

但构思时间却比较的长些。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，我因为神经衰弱，胃病，目疾，同时并作，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，于是每天访亲问友，在一些忙人中间鬼混，消磨时光。就在那时候，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。后来我的病好些，就时常想实现我这“野心”。到一九三一年十月，乃整理所得的材料，开始写作。所以此书在构思上，我算是用过一番心的。

现在写成，自视仍复疏漏。可是我已经疲倦了，而神经衰弱病又有复发之势，我不遑再计工拙，就颀然出版了。

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。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，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（这决不象某一班人所想像那样单纯），以及一九三〇年的“新儒林外史”，——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；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，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；可是都因

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，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，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——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。

我仍得感谢医生诚实，药物有灵，使我今日还能在这里饶舌！

茅盾1932年12月。

再来补充几句

出版社要求我写个新的后记。我以为四十五年前此书初出版的《后记》已经说明了写作经过以及此书之所以成为“半肢瘫痪”的原因；那么，“新”的后记又将说些什么呢？但是出版社却提出具体的要求：说说此书的写作意图。

无可奈何，只好勉力试为之。

一九三九年五月，我在乌鲁木齐，曾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，作了一次讲演。当时的讲演记录后来登载在《新疆日报》的副刊，加了题目：《子夜是怎样写成的？》解放后，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《子夜》把这个讲演记录的一部分译为英文，用《关于子夜》的题目登在本文的前页，算是代序。但是那次的讲演只是以《子夜》为引线，泛论了小说写作的如何必须有生活经验作基础，如何分析社会现象，确定主题思想，然后把握典型环境，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要说《子夜》的写作意图，无非如此这般。但意图同实践，总有距离。就《子夜》而言，它能完成意图的百分之几呢？那么，具体简要地说来，不过如下：

《子夜》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三〇年春末夏初。这短短的时间内，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。第一，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，又一次爆发为内战。汪精卫、冯玉祥、阎锡山为一方，蒋介石为另一方，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，其规模之大，战争的激烈，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记录。老百姓遭殃自不须